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系列丛书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系列丛书》编委会编

司马光与 《资治通鉴》

SIMAGUANG YU ZIZHITONGJIAN

王德保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系列丛书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王德保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王德保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10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系列丛书)

ISBN 7-5004-3532-0

I. 司… II. 王… III. ①司马光-人物研究②资
治通鉴-研究 IV. ①K825.81②K2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5940 号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阿 昕

版式设计 炳 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0.625 插 页 2

字 数 262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 系列丛书》弁言

南昌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科是在原汉语史和现代汉语两个硕士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语史 1979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6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现代汉语 1984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93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1995 年被批准为“江西省普通高校重点建设学科”。1996 年，南昌大学进入“211”以后，应用语言学通过国家教育部和国家计委立项，成为“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001 年 4 月，项目以优异成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211 工程”一期建设专家组的验收。2001 年 12 月，语言文字学被批准为江西省高校“十五”重点学科。本学科共有教师 19 人，其中教授 12 人，副教授 4 人，讲师、助教 3 人。迄今为止，本学科共招收 22 届 107 名研究生（在读 27 名）。其中，16 名先后考取博士研究生，3 人正在从事或已经完成博士后研究，9 人已经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本学科已经形成了一支年龄、学历、职称结构基本合理、成果突出、教学经验丰富的学术梯队。

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几代学者的努力，本学科形成了三个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

一、客、赣方言研究方向。本方向注重研究江西境内的两大方言——客家方言和赣方言。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继续从宏观上研究客、赣方言在语言、词汇和语法上的特点，一方面与江西的地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与客赣方言在江西

的社会应用、语言教学结合起来，与贯彻语言文字法、推广普通话结合起来，与现代信息处理结合起来。1996年学术带头人刘纶鑫教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江西境内的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其终结成果《客赣方言比较研究》（120万字，1999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反映了当前客、赣方言研究的最新动态，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最近，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潘悟云教授的指导下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汉语方言数据库“客赣方言数据库”，并在第五届客家方言暨首届赣方言学术研讨会上公开演示，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

二、现代汉语及其应用研究方向。本方向主要研究：1. 语法；2. 修辞；3. 言语交际；4. 汉语应用的社会问题；5. 汉语信息处理；6. 对外汉语教学。学术带头人陆丙甫教授致力于这一方向多角度的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在句法研究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世纪80—90年代，刘焕辉教授发表了言语交际学的系列成果，以《语言动态研究与交际语言学问题》一文（《中国社会科学》）和《交际语言学导论》一书为学科理论框架，以一套《言语交际学丛书》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言语交际学教程》为普及读物，以集中全国20余所高校20余名学者参著的《言语交际学基本原理》和《言语交际和交际语言》为学术纽带，构成系统工程；《修辞学纲要》用组合理论系统建构修辞学体系，自成一家。姚亚平教授在此基础上，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教委项目和省重点项目“我国中等城市独生子女语言调查研究”、“中国语言伦理传统和现阶段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现代语言规划研究”、“现阶段我国语言应用问题”、“推广普通话实践中的问题和对策”，出版了《中国计算语言学》和《当代中国修辞学》等专著和大量论文，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三、古代汉语及其在古籍整理中的应用研究方向。本方向的主要特色在于致力于古代语言本体研究的同时，努力把古代汉语

的研究和古籍整理结合起来。学术带头人陆锡兴教授长期从事文字学研究，在传统文字学、普通文字学、汉字传播学、汉字民俗学、汉字形体学等方面都有探索。20世纪90年代初曾以《汉代简牍草字编》一书获王力语言学奖。最近完成的《汉字传播史》（语文出版社出版）、《汉字的隐秘世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两本专著，都是开创之作，填补了空白。他主编的《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各分卷已陆续出版）历时十余载，收词10万多条，全书1000余万字，将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相结合，材料翔实，结论扎实严谨。本方向结合江西省丰富的古籍资源，承担了大量国家级和省部级古籍整理项目，如《江西地方志通考》、《江西古籍考》、《〈正字通〉点校》、《历代骈文研究》、《〈六松堂集〉点校》、《明清时期江西地方文献研究》、《豫章丛书整理》、《骈雅疏证》，等等，还参加了教育部的古籍整理重点项目《全宋诗》、《二十四史今译》等。

本学科三个研究方向的研究，主要体现了三方面的特色：

1. 注重地方特色，充分利用江西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方言资源。

2. 注重应用研究。除了交际语言学、修辞学和社会语言学等着力解决汉语在当代社会面临的各种理论和实际应用问题之外，方言研究和古代汉语研究也注重其应用。

3. 注重科技手段。本学科列为“211”工程重点学科之后，进一步充实了语言学中心实验室。实验室面积320平方米，配有586多媒体工作站6台，586有盘工作站20台，普通计算机40台及多媒体投影机、视频展示台、语音分析仪、扫描仪、打印机、复印机、刻录机等一整套现代化设施，拥有当前国际国内语言研究和古籍整理中比较先进的各种软件。本实验室与南昌大学信息网络中心ATM连接，并且已联通中国教育和科研网——CERNET和INTERNET网，可共享国内国际信息资源，其总体规模和档次

在国内高校、特别是在地方院校文科中处于领先水平。

我们广泛开展了学术交流活动，经常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讲学，荣幸地聘请了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陈章太、戴庆夏、侯精一、胡名扬、刘坚、鲁国尧、陆俭明、潘悟云、王克仲、王宁、邢福义、熊正辉、杨忠等先生为本校的兼职教授，得到了学术界多方面的关注与支持。

这套丛书，是近年来本学科的部分研究成果或教材，现在先出版第一辑，待条件成熟以后，再陆续出版以后各辑。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匆促，一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系列丛书》编辑组
2001年12月1日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司马光所处时代与《资治通鉴》	(16)
第一节 文化繁荣 学术昌明	(16)
第二节 稽古右文 编撰大书	(24)
第三节 文人的历史意识与使命感	(37)
第二章 司马光的史学观与《资治通鉴》	(54)
第一节 正统的儒家史学观	(54)
第二节 继承实录的史学传统	(68)
第三节 以史为鉴的著书目的	(78)
第三章 司马光的从政经验与《资治通鉴》	(99)
第一节 重视谏议问题	(100)
第二节 变法与朋党问题	(107)
第三节 当时政局与《资治通鉴》选材	(116)
第四节 司马光的个性、品格与《资治通鉴》 选材	(128)
第四章 司马光的文献学成就与《资治通鉴》	(144)
第一节 考证信实的学术风格	(145)
第二节 《通鉴考异》的考证范围	(166)
第三节 《通鉴考异》释例及考证方法	(188)
第五章 司马光的文学成就与《资治通鉴》	(201)
第一节 司马光的诗歌创作	(201)

第二节	司马光的散文创作·····	(231)
第三节	《资治通鉴》的文学成就·····	(253)
第六章	《资治通鉴》的史源问题·····	(273)
第一节	战国秦汉时期的史源·····	(273)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的史料来源·····	(292)
第三节	隋唐五代的史料·····	(312)
参考文献	·····	(331)

引 言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无疑是中国历史文献中最重要
的编年史著作，其记事年代从东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403）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三年。
以记事时间而论，仅次于纪传体史书《史记》。由于《史记》上
溯至茫然难考的五帝时代，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仅三
卷，史料极其缺乏，记事至为简略。因此就记事而论，《通鉴》
的内容最为丰富。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另有《考异》三十卷、
《目录》三十卷。时间之广，规模之宏，实属罕见。朱熹云：

司马温公受诏纂述《资治通鉴》，然后千二百六十
二年之事，编年系日，如指诸掌。虽托始于三晋之后，
而追其本原，起于智伯，上系左氏之末章，实相受授，
伟哉，书乎！自汉以来，未始有也。^[1]

朱子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说《通鉴》是汉代以来最重要的历史著作，绝非过誉之词。

《文献通考总序》言：“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
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
在。”作为一部历史著作，无论它的创作动机如何，首先，必须
是一部信史。马氏言《通鉴》将“十七史记述，萃为一书”，使
后世学者，通过此书即可了解以往各代历史，这的确体现了《通

鉴》最主要的价值。这一说法也符合司马光的编书宗旨。

对于这样一部规模空前、内容丰富的编年体著作，历代学者都予以极高评价。大抵说来，后世学者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这部书的政治功用和学术价值。

胡三省云：“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2]这种颇具感情色彩的赞誉之词，几乎将《通鉴》看做治国、修身、立法、用兵的百科全书。胡三省毕生用功于《通鉴》的注释，是《通鉴》的大功臣，他对此书的情感是可以理解的。

王夫之说：“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曰‘资治’者，非知治乱而已也，所以为力求治之资也，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知其有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3]他所作《读通鉴论》便是读《资治通鉴》的心得，他所谓“知其有以致治而治”，“知其有召乱而乱”之说，代表了后人读《通鉴》的一般看法。

司马光主编《通鉴》时，他的确希望此书能成为朝廷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后世评价《通鉴》的成就，恰恰着眼于这种功利作用，将其视为治理国家的教科书。《通鉴》极高的学术价值，亦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四库全书·通鉴提要》云：“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训诂，浩博奥衍，亦非浅学所能通。”^[4]此书取材丰富，考辨精当，显示出编撰者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近人岑仲勉先生谓：“《资治通鉴》是我国极负盛名之通史，论到编纂的方法，史料的充实，考证的详

细，文字的简洁，综合评论，确算它首屈一指。”^[5]此确属中肯之言，通过《通鉴考异》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作者取材之丰富几乎已将当时能见到的文献材料收罗殆尽，而且对史实的不同记载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说明取舍之由。为自己的著作作考异，是司马光的创举，对后世修史无疑有极其良好的示范作用，后世同类史书，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毕沅《编资治通鉴》皆仿《通鉴》作考异。此书从英宗治平二年（1066）始置局修书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修成，共耗时十九年，这在古代官修史书中也是罕见的。诚如司马光在成书之后上表所言：

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臣今骸骨癯瘠，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6]

考虑到他所选择的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都是当时学识渊博，业有所精的史学专家，以近二十年的时间，孜孜矻矻地从事编纂，其精细可以想象。又得到朝廷的全力支持，提供了良好的写作条件。因此，《通鉴》之所以成为中国史籍中最严谨的著作，绝非偶然。

作为《资治通鉴》主要编纂者的司马光，在成书过程中无疑起了主导作用。他的史学思想、政治实践、文献学思想以及选材标准，对《通鉴》的各方面成就都有直接影响。他个人具有的素质，包括他的学养史识、性格特征、仕途履历、价值观念都会对《通鉴》的成书有所影响。很显然，没有司马光便不会有《资治通鉴》这部书，或者说，如果不具备司马光所具有的素质，《通鉴》便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司马光的综合素质在很大程度上

度上决定了《通鉴》的学术水平。

我们今天审视《资治通鉴》这部书，再也不会将其作为治国安邦的训世宝典，也不会认同此书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价值体系。从这个意义来说，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7]这种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初始目的，在今天已无意义，但是这并不是说，《通鉴》全书的思想内容已全然失去现实价值。司马光作为一个正直的政治家，在书中赞颂贤明君主的励精图治和优秀官员的廉洁奉公，揭露昏暴之主的荒淫无道和贪官污吏的横行不法，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作者歌颂历史人物所表现出来的优秀品德，如正直勇敢，爱惜名誉，爱国尽职，节俭勤勉等，依然是我们敬重的传统美德。再如对历史上各种丑恶现象予以鞭挞，作者所依据的价值标准，撇开其正统的封建观念不论，其优良传统道德原则依然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仍然认同他对历史上许多人物的评价，也觉得作者对许多历史事件的描述，其分寸尺度十分适中。这固然因为作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客观准确地记载历史事件，另一方面，也表明书中恪守的一些评判标准，依然没有过时。

《通鉴》这部巨著，自出现以来就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历代学人对它的研究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注释和考据。最早为《通鉴》作注的人是北宋的刘安世，作《通鉴音义》十卷，此书今不传，依书名看，大约是为《通鉴》注释字音字义的书。现存最早的注是北、南宋之际的史炤，他以十余年功力而成《通鉴释文》三十卷。胡三省在《通鉴释文辨误》中云：

《通鉴释文》行于世，有史炤本，冯时行为之序；公休（司马光子康字公休）本刻于海陵郡斋，前无序，后无跋，直置公休官位姓名于卷首而已。又有成都府广

都县费氏进修堂板行《通鉴》，于正文下附注，多本之史炤，间以己意附见，世人以其有注，遂谓之善本，号曰“龙爪《通鉴》”。要之，海陵《释文》、龙爪注，大同而小异，皆蹈袭史炤者也。^[8]

由此可见，史注在有宋一代是影响最大的注本，当时流行的很多注本都以史注为蓝本，后人拟托司马康所作的注本也多本以史注。《四库全书》未收《通鉴释文》一书，馆臣在为三省《通鉴释文辨误》所作提要时说：“《通鉴释文》本南宋时人史炤所作，浅陋特甚，时又有海陵所刊释文，称司马康本，又蜀成都府广都县费氏进修堂板行《通鉴》，亦以注附之，世号‘龙爪《通鉴》’皆视史炤本差略，而实相蹈袭。”^[9]馆臣认为史注错误很多，可能是《四库》不收的重要原因。《四部丛刊》和《宛委别藏》皆收史注，平心而论，史注确有错讹，但并非馆臣所谓“浅陋特甚”。在注字音、解字义方面下功夫很深，而且某些成果也为胡注所吸收。

王应麟所作《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是专门注释《通鉴》地理的著作。王氏是宋末元初著名学者，博洽多闻，尤长于地理。他在序文中说：“余闲居观《通鉴》，将笺释其地名，举纲提要，首以州域，次以都邑，推表山川，参以乐毅王朴之崇论宏议，稽左氏、《国语》、《史记》、《战国策》、《通典》所叙历代形势以为兴替成败之鉴。”此书极为精审，四库馆臣谓：“其中征引浩博，考核明确，而叙列朝分据攻战，尤一一得其要领，于史学最为有功。”^[10]

与王氏同时的胡三省以毕生精力注释《通鉴》，完成《资治通鉴音注》，即著名的胡注，这是《通鉴》最通行而又最优秀的注本。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一书的后记中说：“像《通鉴》这样一部包括一千多年历史的编年巨著，要给它作注解，无

疑是一项艰辛的工作。虽说前四史有旧注，但不是都可采用；至于晋到五代各史，本来都没有注。胡三省能够有这样惊人的成就，实在值得敬佩。胡注不仅对阅读《通鉴》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对研究晋宋以来诸史也有很多启发。所以说胡注和《通鉴》同样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孙钦善先生说：“胡三省的《通鉴注》，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通鉴》注释的巨大成果，还在古文献研究的方法、理论上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启示。”^[11]《通鉴注》与《通鉴》一样成为古代文化遗产中不朽的瑰宝。胡注在史实考证、制度考证、校勘训释、纠谬订误诸方面皆谨严审慎，成果丰富，不愧为《通鉴》一书的大功臣。胡注一出，其他诸注便衰微不行了。胡注本身也成为后人研究对象，如清人陈景云有《通鉴胡注举正》，原书十卷，现存一卷，《四库总目提要》云：“是书皆参订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之误，凡六十三条，而所正地理尤多，颇为精核。”^[12]对胡注研究最有心得的是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在他的名作《通鉴胡注表微》一书中，对胡注的学术成就和政治意图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刘乃和先生说：“《表微》内容非常丰富，作者辛勤撰写三年多时间，将几百万字的《通鉴》和《胡注》翻来复去研究多少遍，对胡三省作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特别是对胡氏‘隐藏在文字里的思想感情的探索’，终于对胡三省作出了新的结论，这个功绩是不可泯灭的。”^[13]

对《通鉴》之误进行研究的学者，历代皆有，值得一提的是现代隋唐史专家岑仲勉先生所著《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岑先生比勘史料，共发现《通鉴》隋唐部分错误六百余处。即便如此，岑先生依然认为《通鉴》是我国古代历史典籍中考证最为精审的巨著。

二、续作和改写。《通鉴》出现之后，就成为我国编年体历史著作的典范。最早续《通鉴》的著作是南宋杰出的史学家李焘

所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总目提要》言：“踵司马光《通鉴》之例，备采一祖八宗事迹，荟萃讨论，作为此书。以光修《通鉴》时先成长编，焘谦不敢言续《通鉴》，故但谓《续资治通鉴长编》。”此书五百二十卷，篇幅超过《通鉴》，言宋朝一祖八宗之事，史料极为详赡，又仿《通鉴考异》，也作考异，列出各家之说，是一部极严谨的史学杰作。清人谭钟陵重刻此本序云：“宋司马温公，欲作《资治通鉴》使刘攽等为长编，其后李文简为《续长编》实继温公《通鉴》而作。曰《续长编》，不曰《通鉴》，谦也。然文简此书，上据国典，下采宋私记，参考异同，折衷一是使北宋一代事，实粲然明备，实为《通鉴》后不可不读之书。”^[14]此书诚如作者所言依照《通鉴》做长编之法，在广泛收集北宋一朝史料的基础上，取一家之说。与《通鉴》不同的是，《长编》有关朝廷活动的记载特别详细，在长处方面，它保留了较为翔实的史料，为研究北宋史实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亦有负面的问题，作为一部史书来说，有些事颇有琐屑之嫌，史料的裁剪之功显然不如《通鉴》。《续长篇》无疑是《通鉴》之后优秀的续书。南宋时期与《续长篇》性质相同的书尚有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四库总目提要》云：“是书述高宗朝三十六年事迹，仿《通鉴》之例。编年系月，与李焘《长编》相续。”此书二百卷，以相对篇幅而言，史料更比《续长编》详赡。馆臣又云：“其书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牘奏议，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岐而不病其杂。”^[15]这部书也是研究宋史的重要参考书。有宋一代其他不那么著名的续书尚多，如陆唐老《增节音注资治通鉴》一百二十卷，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无名氏《靖康要录》等。元明两代不乏续书者，如元人有陈桱《通鉴续篇》二十四卷，主要记两宋之事。明人胡粹中撰《元史续编》十六卷，上接陈氏之书。部头较大的有明薛应旂《宋元资

治通鉴》一百五十七卷，馆臣将此书归于编年类存目书：云：“是编续司马光《资治通鉴》而作，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尝讥其孤陋寡闻。”^[16]

清人有两部著名的续书，一是徐乾学主持的《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徐氏是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外甥，官至刑部尚书，曾主持《一统志》的编撰，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显贵。他集合了当时的著名学者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等参加撰写。《四库总目提要》云：“凡事迹之详略先后有应参订者，皆依司马光之例，作考异以折衷之。其诸家议论足资阐发者，并采系各条之下，间附己意。亦依光书之例，标臣乾学曰以别之。”此书未定稿，乾学即歿去，而且当时藏于秘府的《永乐大典》，尚未向世人开放，比如一些重要的典籍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熊克的《中兴小记》，都无法参考，多少影响了此书的价值。另一部书就是毕沅主持修撰的《续资治通鉴》。毕沅曾官兵部尚书、湖广总督，是清代学者中极为显贵者。此书用力至勤，其刊行者冯集梧说：“兹书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而参以《续资治通鉴长编》《契丹国志》等书，以及各家说部文集约百十余种，仿《通鉴考异》之例，著有考异，并依胡氏三省分注各正文下。事必详明语归体要，经营三十余年，延致一时轶才达学之士，参订成稿。复经余姚邵二云学士核定体例，付刻又经嘉定钱竹汀詹事逐加校阅。”^[17]当时参加著书者除冯氏所说的邵晋涵、钱大昕之外，还有王鸣盛、章学诚、洪亮吉等名家，尤以精通宋史的邵晋涵出力最多。章学诚为毕沅作书与钱大昕讨论续书之事云：“今宋事据丹棱、井研二李氏书而推广之，其《辽》、《金》二史所载大事，无一遗落，又据旁籍以补其逸，亦十居三四矣。元事多引文集，而说部则慎择其可征信者。仍用司马氏例，折衷诸说异同，明其去取之故以为《考异》；惟不别为书，注于本文下以便省览，即用世传胡天台注本《考异》散附本文之义例也。”^[18]此书晚出，